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路径研究

李楠 李雨霏

摘要: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研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互动机理,可以围绕理论逻辑、价值意蕴与实践路径三个方面展开。在理论逻辑层面: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确立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提供了价值根基;“第二个结合”的方法论创新构建起传统与现代的对话机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实践形成了传统资源创新发展的科学范式。在价值意蕴维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大道之行”的天下理想与共产主义信仰形成精神共鸣,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筑牢了共同理想根基;“实事求是”的实践智慧与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深度融合,夯实了价值观培育的哲学基础;“协和万邦”的文明观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价值贯通,拓展了全球治理的文明视野。在实践路径方面:强化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巩固思想阵地;激活传统文化的时代生命力,重塑文化主体性;创新传统治理智慧转化机制,构建现代化治理体系,形成“守正—创新—致用”的逻辑框架。

关键词: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路径

中图分类号: D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0751(2025)04-0023-08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出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他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1] 这一论断深刻揭示:文化传承创新是民族复兴的深层动力,更是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的精神根基。当前,世界文明对话格局深度重构,西方现代化模式困境凸显,亟须从中华文明五千多年的精神富矿中提炼价值共识,为人类文明新形态建设提供中国智慧。在此背景下,探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路径,具有双重战略意义。这既是筑牢文化主体性、增强民族凝聚力的必然要求,也是打破“文明冲突论”桎梏、贡献全球治理中国方案的关键之举。当传统文化的“天下情怀”升华为人类命运

共同体的实践智慧,当“革故鼎新”精神转化为全面深化改革的行动逻辑,中华文明便以兼收并蓄的包容性、守正创新的开拓性,为人类现代化进程标注新的价值坐标。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论逻辑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理论逻辑的确立,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与中华文明精神基因的深层契合之上,通过“两个结合”的方法论突破,形成传统价值现代转化的完整体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有植根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才能根深叶茂。”^[2] 这一重要论断揭示了三重理论逻辑:马克思主义指导

收稿日期:2025-02-06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以‘两个结合’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研究”(23ZDA006)。

作者简介:李楠,男,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书记、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 102488)。李雨霏,女,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生(北京 102488)。

地位的确立,为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提供根本指导;“第二个结合”的实践,构建起文明基因激活的方法论体系;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两创”)范式的形成,开辟了传统资源创新发展的实践进路。这一逻辑既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高度的文化自觉,也体现了中华文明“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为培育全民族共同价值认同奠定了坚实的学理基础。

1.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逻辑起点

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逻辑起点,这一理论定位具有深刻的哲学必然性、历史选择逻辑和系统整合机制。从哲学维度审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真理追求和价值取向层面存在深层契合。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唯物史观强调:“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3]这与中华文化“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实践理性传统形成哲学共鸣。《共产党宣言》中“自由人联合体”的构想,与《礼记·礼运》中描绘的“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社会理想,共同指向人类对美好生活的终极追求。这种价值同构性为二者的融合提供了逻辑基点。而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对“执两用中”“物极必反”等传统思维的统摄提升,更将朴素辩证法升华为科学方法论。

从历史演进维度考察,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确立是近代中国社会变革的必然选择。鸦片战争后,面对“大变局”,从“中体西用”到“全盘西化”的思想实验相继失败,直至十月革命送来马克思主义,中国才真正开启文明转型的正确道路。毛泽东指出:“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4]这种历史选择绝非偶然。中华文化“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革新基因,与马克思主义“改变世界”的实践品格深度契合;传统文化“协和万邦”的天下观,与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精神形成价值共振。中国共产党作为“两个结合”的自觉践行者,既继承“修齐治平”的文化使命,又秉持“为人类求解放”的政治自觉,在理论创新中实现了文明基因与科学真理的创造性对接。

在系统整合层面,马克思主义发挥着价值过滤器和理论坐标系的双重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5]这本质上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建立传统文化现代转化的筛选机制。如仁、义、礼、智、信等传统伦理,经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的创造性转化,升华为“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公民准则;《尚书》中的“明德慎罚”思想,通过法治理论淬炼,转化为“全面依法治国”的治理理念。这种转化不是简单的概念置换,而是通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个“意义枢纽”,实现传统话语向现代价值体系的范式转换。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提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次历史性飞跃,本质上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明深度互鉴的理论结晶,其中既包含着对知行合一传统的实践论提升,也体现着对自强不息精神的唯物史观阐释。

2.“第二个结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方法指导

“第二个结合”作为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开创了文明传承发展的新范式。这一方法论突破的本质,在于构建起了跨越时空的文明对话机制,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转型提供了科学的理论工具。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结合’的结果是互相成就……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6]这一重要论断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明双向互鉴的内在机理:既不是简单的理论移植,更非被动的文化妥协,而是在文明平等对话中实现价值重构的创造性过程。

从方法论特质看,“第二个结合”破解了困扰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的“体用之争”。它突破“中体西用”的机械二分法,建立起文明主体间性的对话平台。在认识论层面,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与儒家“知行合一”传统形成范式融合,将“行者知之成”的经验论提升为“实践—认识—再实践”的辩证认识论;在价值论维度,共产主义理想与“天下大同”愿景通过意义再生产,共同构建起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价值坐标。这种对话机制具有双重解构功能:既破除了文化复古主义对传统的僵化固守,又消解了历史虚无主义对文明连续性的否定,在批判继承中开辟了文化传承的新路径。

在理论创新维度,这一方法论重构了文化演进的本体论基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表明,中华文明基因始终是其理论创新的本体论承诺。毛泽东将“实事求是”从考据学命题升华为党的思想路线,邓小平用“小康”概念诠释现代化建设目标,习近平总书记以“人类命运共同体”重构国际关

系理论,这些创新本质上都是文明基因的现代激活。通过建立“原型—类型—范式”的转化模型,传统文化符号在马克思主义语境中获得新意义。如“阴阳”范畴被赋予矛盾对立统一的新内涵,“革故鼎新”精神发展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方法论,实现了文明基因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在系统建构层面,“第二个结合”构建起多维度的理论融合机制。概念互释体系方面,“民惟邦本”与人民主体思想通过语义对接,形成“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哲学;逻辑贯通机制层面,“格物致知”传统经实践认识论改造,发展为调查研究制度;价值扩容路径方面,“和而不同”理念通过唯物辩证法阐释,升华为文明交流互鉴的价值准则。这种系统性建构不是简单的概念拼接,而是通过“价值中介”机制实现的深度“化合反应”。正如《论语》中“温故而知新”的治学之道,在马克思主义真理力量的激发下,传统文化中“苟日新,日日新”的革新精神,转化为理论创新的不竭动力。

3. 文化“两创”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践进路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关键实践进路,在于通过“两创”机制实现传统价值的现代化转型。其理论体系的核心逻辑,是通过构建“本土化诠释—全球化表达”的协同模型,突破历史遗产的静态传承与异质文化的单向影响,以系统性创新激活文化基因的现代性重构。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必须以守正创新的正气和锐气,赓续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7]这一论断深刻揭示了文化“两创”范式的本质特征:在坚守文明根脉中开拓新境界,在推动文明演进中守护精神命脉。

从范式理论特征审视,文化“两创”构建起传统价值转化的双重合法性。历史维度上,通过“原型—类型—范式”的三阶转化模型,赋予传统文化现代转型的历史正当性。如《周易》中“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革新精神,经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阐释,升华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方法论;《孟子》中的“仁政”思想,通过现代治理理论转化,发展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模式。现实维度上,建立文化主体性生成机制,在古与今的对话中重构文化自我。这种重构不是文化身份的简单确认,而是通过价值甄别、意义重构、传播接受的全链条创新,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滋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活水源头。

在系统理论架构层面,文化“两创”形成独具特色的价值再生产体系。价值甄别体系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尺度,建立传统文化要素的三维评估模型:政治性维度剔除封建等级观念,文化性维度萃取“礼义廉耻”等精神标识,时代性维度激活“革故鼎新”等革新基因。意义再生产机制层面,运用符号学“能指—所指”理论重构文化表达:将敦煌壁画从宗教艺术符号转化为文明交流的“丝路语言”,将《孙子兵法》从军事典籍升华为现代管理智慧。传播接受理论则依托文化记忆理论,构建“典籍阐释—艺术呈现—生活浸润”的立体传播体系,使《诗经》中“风雅颂”的审美传统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全过程。

这一范式的理论创新价值在于开辟了文明演进的新逻辑。它破解了“传统—现代”的二元对立,构建起文明连续体的理论范式。黑格尔“正题—反题—合题”的线性进化论,被转化为守正创新的螺旋上升模式;文化相对主义的碎片化认知,升华为“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共生逻辑。更重要的是,它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建构提供了东方方案:将“天人合一”的哲思升华为可持续发展理论,让“协和万邦”的天下观具象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这种理论创新不仅彰显了中华文明的主体性,更在文明对话中开创了“以文明超越文明”的新境界。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值意蕴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过程,既植根于中华文明五千多年的精神沃土,又彰显着科学社会主义的时代品格,为培育全民族共同认同的价值体系提供了历史逻辑与实践智慧。其价值意蕴主要体现在三个维度:以“大道之行”的天下情怀筑牢共同理想根基,使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与大同社会追求形成精神共鸣;以“实事求是”的方法论传统夯实实践哲学基础,推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与中华实践智慧深度融合;以“协和万邦”的文明观拓展全球治理视野,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中华天下观的价值贯通。这三个维度相辅相成,共同体现了对中华文明精神标识的传承创新。

1. “大道之行”的价值基因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共同理想根基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大道之行”的价值基因与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相契合,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提供了共同理想根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在倡行“大道”的社会中,当人们普遍践行“选贤举能”“讲信修睦”的价值准则时,“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的大同图景便具有了现实可能性。马克思在批判继承前人思想的基础上,科学揭示了共产主义社会的本质特征:“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8]⁴²²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自由人联合体”的构想,与中华文明“天下为公”的政治理想形成了跨时空的价值共振。这种深层次契合通过“第二个结合”的创造性实践,实现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文明基因的深度融合。具体而言,马克思主义的和谐社会思想对应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其宗教批判理论呼应着中华民族“敬天法祖”的现世精神和“乐生”信仰,其实践哲学观照出中华文明“知行合一”的务实品格,其人民主体思想更与“民惟邦本”的治国理念形成理论共鸣。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人民精神境界极大提高的共产主义社会,与“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大同理想,共同构筑起人类文明发展的价值坐标,为世界文明演进提供了双重理论支撑。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动态发展的开放式价值体系,其发展遵循文化再生产的实践逻辑,必将随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的深化,在坚守“共产”初心的实践中不断完善自我。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契合性、与中华民族价值观念的耦合性,使得通过“第二个结合”的实践创新能够有效激活传统文化中的社会主义基因。这种创造性转化不仅实现了传统价值理念的现代化升华,更在文明根脉与科学理论的深度融合中,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价值体系。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9]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正通过系统整合传统文化精髓与马克思主义真理力量,持续强化其引领效能。这种双向赋能的价值建构模式,既夯实了共产主义理想的文化根基,又通过激发人民群众的主体意识,将崇高信仰转化为实现民族复兴的实践伟力,为推进人类文明新形态建设注入不竭动力。

深化“大道之行”价值基因的当代转化,需构建“理想传承—制度创新—实践赋能”的贯通机制。

在理论阐释层面,通过典籍数字化工程激活《礼记》中“天下为公”的治理智慧,使其与全过程人民民主理念深度对接;在制度设计层面,将“选贤举能”传统升华为新时代干部选拔的德才标准,构建“能上能下、优胜劣汰”的用人机制;在基层治理中,创新“邻里议事会”“乡贤调解室”等实践载体,使“讲信修睦”伦理转化为化解矛盾、纠纷的多元体系。浙江“枫桥经验”的迭代升级正是典范:既承续“以和为贵”的治理传统,又融入法治化、智能化手段,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鲜活样本。这种转化实践深刻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创新成果,使“大道之行”的理想基因深度嵌入国家治理体系,为人类文明新形态建设提供了价值引领。

2.“实事求是”的方法论传统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奠定了实践哲学基础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实事求是”的方法论传统与党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中总结出的制胜法宝相承接,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奠定了实践哲学基础。实事求是的本质要求是以客观实践为认知本源,从现实存在中探求真理规律。这种肇始于汉代经学的研究方法,经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中的创造性转化,已发展成为贯穿一百多年党史的思想精髓,塑造了具有鲜明中国风格的实践哲学体系。

1938年,毛泽东同志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论新阶段》报告中首次公开提出“实事求是”;1941年,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更对“实事求是”作出系统阐释和科学界定。1978年,邓小平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上通过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中,不仅恢复了党的思想路线,更将其实践维度拓展至“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方法论层面,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构建提供了方法论支撑。进入新时代,党中央系统推进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理论深化与实践创新。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地提出:“坚持实事求是,就是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来研究和解决问题。”^[10]将实事求是这一思想传统的实践品格提升到新的历史高度。从脱贫攻坚精准施策到全面深化改革系统推进,实事求是的哲学智慧已转化为新时代治国理政的实践范式,彰显出百年大党在理论创新与方法论突破上的高度自觉。

当前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践,本质上是实事求是方法论的时代演绎。这一战略构想的提出,既基于文化强国建设的现实

需要,更植根于中华文明现代转型的历史必然。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地将“实事求是”原则贯穿于“两个结合”的全过程,既注重在文明根脉中发掘契合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元素,更强调通过实践检验实现传统价值的现代转化。这种立足实践、守正创新的方法论特质,在“第二个结合”的提出与深化中得到充分彰显——既不是简单化的文化拼贴,更非抽象化的理论嫁接,而是通过激活传统文化中的实践智慧,使马克思主义真理力量获得更具象的文明载体。

站在新的历史方位,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对于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特殊意义。这要求我们在文化涵养过程中始终把握三个维度:在价值取向上坚持实践检验标准,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转化始终服务于民族复兴的实践;在方法论层面完善调查研究机制,确保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始终扎根中国大地;在主体维度强化群众路线意识,通过提升全民思辨能力夯实价值观培育的社会基础。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聚变为新的理论优势,不断攀登新的思想高峰”^[11]。这种贯通不仅是理论逻辑的契合,更是实践智慧的共鸣,为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了独具中国智慧的方法论启示。

3.“协和万邦”的天下观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拓展了全球治理视野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协和万邦”的天下观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深度契合,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拓展了全球治理视野。马克思主义的人类解放理想与中华文明的天下情怀,在“为人类求解放”^[12]的价值维度上形成理论共鸣。马克思、恩格斯立足人类社会的宏观视野,以“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8]435}的革命宣言,开启了人类解放事业的壮阔征程。而在中华文明语境中,“百姓昭明,协和万邦”的治理智慧,“四海之内皆兄弟”的伦理情怀,经由张骞出使西域、郑和七下西洋的文明互鉴实践,早已熔铸为中华文明的精神基因。中国共产党人继承这些精神遗产,将解放人类的终极追求具象化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方案,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观和“协和万邦”天下观的创造性发展。如今,“一带一路”建设作为精神遗产的当代演绎,既延续着古丝绸之路“使者相望于道,商旅不绝于途”的交往传统,更通过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发展经验共享共鉴,为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提供历史基因与现实注脚的双重支撑。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内生性价值体系,其

本质属性天然具有向人类共同价值敞开的理论品格。这种辩证统一体现在:既立足民族复兴需要建立精神纽带,又依循“自由人联合体”的终极理想拓展文明格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立己达人”的价值自觉,与马克思主义解放全人类的实践指向相互激荡,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突破地域性文化框架成为可能。当前,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的文明新形态,既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全新选择,更通过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等制度性创新,将“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13]的全人类共同价值转化为实践方案。当单边主义、文明冲突论甚嚣尘上之际,中国“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包容超越文明优越”^[14]的实践探索,既是对“协和万邦”传统的现代诠释,更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精神的当代践行。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本质上是在文明对话中重构价值共识的生成机制。这要求我们,既要深入阐释“协和万邦”天下观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价值同构性,构建具有中国智慧的全球治理话语体系;又要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置于文明交流互鉴的动态过程中,使其在解答“世界之问”的实践中获得理论升华。中华文明的天下情怀与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精神一旦实现“聚变”,就必将为破解全球治理困境、重塑人类文明秩序贡献中国智慧,书写不同文明“美美与共”的时代篇章。

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践路径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践路径,遵循“守正—创新—致用”的三维逻辑:通过强化党的意识形态领导筑牢思想根基,依托传统文化创新激活精神动力,运用治理智慧转化提升实践效能,形成从价值引领到制度建构的完整闭环。在“第二个结合”的理论指引下,既要守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正”,在多元思潮激荡中巩固主流价值阵地;又要创传统文化转化之“新”,通过“两创”实践重塑文化主体性;更须致治理效能提升之“用”,将传统治国智慧升华为现代治理能力。三者有机统一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动实践,既彰显了中华文明连续性的内在优势,又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推进文化创新的实践自觉,为全面建成社会

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了理论支撑、文化滋养和治理保障。

1. 加强党对意识形态工作领导, 巩固社会主义思想阵地

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思想文化领域的指导地位。马克思主义在思想文化领域居于根本指导地位, 既是历史的选择, 又是理论的必然。这一历史选择源于马克思主义作为无产阶级科学世界观的理论品格。其揭示人类社会发 展规律的真理力量, “能够掌握最革命阶级的千百万人的心灵”^[15], 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根本思想指引。作为开放的理论体系, 马克思主义既“吸收并进一步发展中世纪封建势力和僧侣势力斗争的‘18 世纪的精神’”, 又“吸收并进一步发展 19 世纪初那些哲学家和历史学家的经济主义和历史主义”^[16], 更以鲜明的实践品格承担起揭示现代社会矛盾本质、引领人类解放道路的使命。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初步探索, 到改革开放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构建, 再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 马克思主义始终在与中华文明基因的深度互动中焕发真理力量。这种历史演进不仅印证了马克思主义的开放性和包容性, 更彰显其作为“伟大的认识工具”的实践伟力。新时代,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涵养的实践必须始终以马克思主义为价值建构的“定盘星”, 在多元文化激荡中筑牢思想根基, 在文明传承创新中把准政治方向, 确保意识形态阵地始终闪耀真理光芒。

牢牢掌握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在社会主义文化发展进程中, 党始终发挥着主导力量的关键作用, 是筑牢意识形态防线的根本政治保障。现阶段思想文化战线正经历多重考验: 多元文化碰撞、文化认同波动、信仰体系受冲击等, 亟须强化党的政治引领力和思想凝聚力。我们党在一百多年的奋斗中锻造出科学把握意识形态斗争规律的政治智慧, 在领导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实践中凝聚起最广泛的群众基础, 这种历经淬炼的领导能力, 正是新时代应对意识形态领域复杂局面的底气所在。从延安时期确立“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 到新时代构建“网上网下同心圆”的传播格局, 中国共产党始终以高度的历史主动精神引领意识形态建设方向。当前, 面对算法推荐、短视频等带来的传播方式变革, 更需强化党对全媒体传播体系的顶层设计。因此,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涵养的实践, 必须从政治高度把握意识形态领导权建设, 通过完善意识形态工作

责任制、健全意识形态领域风险研判机制、创新主流价值传播体系等制度设计, 将党的领导贯穿于价值观涵养的全过程, 为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构筑坚实的政治保障。

不断用党的创新理论成果武装头脑。意识形态建设本质上是用先进理论武装群众的过程, 必须与时俱进强化思想理论武装。习近平文化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本土化与当代发展进程中形成的重大理论创新, 科学阐释了新时代文化建设的战略导向与核心命题, 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转化激活与创新发展确立了根本性指导原则。这一思想深刻阐释了“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的实践要求, 既强调对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科学认知, 又注重在守正创新中激活文化基因的时代价值。新时代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践, 最紧要的任务和第一位的要求就是高擎习近平文化思想旗帜。要深刻领会这一思想的时代背景、科学体系、精神实质、丰富内涵, 以“第二个结合”重大创新观点为引领, 深学细悟关于赓续中华文脉、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论述, 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全党、教育人民, 切实做到学而信、学而用、学而行, 引领当前工作再上新台阶, 呈现新气象、新变化。

2. 激活传统文化的时代生命力, 重塑民族的文化主体性

把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先机。在文明复兴的历史节点,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历史性机遇。随着“东升西降”国际格局的深刻演变, 西方现代化模式的解释力日渐式微, 这为重释中华文化价值提供了战略窗口。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中, 亟须实施文化发展战略, 将传统文化创新深度嵌入现代化进程, 通过构建文化遗产活化利用体系、完善文化 IP 转化机制、创新文化传播范式等制度性安排, 借助“资以故实, 酌于新声”的战略思维, 使“周虽旧邦, 其命维新”的革新精神转化为文化创新的实践动能。因此, 必须聚焦“第二个结合”的理论创新, 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明的对话中提炼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符号, 为人类文明进步提供彰显中国智慧的价值方案。

深度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备豫不虞, 为国常道。面对全球价值秩序重构的时代课题,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阐释具有特殊战略意义。当西方启蒙理性陷入解释力危机之时, 中华文

明“经世致用”的实践智慧、“和而不同”的包容理念和“天人合一”的生态哲思,恰恰为解答现代性困境提供了思想资源。这要求我们建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科学方法论:既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甄别、提炼传统文化精髓,又要通过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实现传统价值理念的当代表达。重点在于系统破解“守正”与“创新”的转化密码,既坚守“民惟邦本”的价值内核,又创新中华文化的传播渠道和赋能路径,使传统文化在解答现实问题中彰显永恒魅力。

重塑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文化主体性的建构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度融通的理论前提与实践基础。这种主体性并非静态的文化标签,而是动态的价值创造过程——既要在文明交流中坚守“和而不同”的自主意识,又要通过“返本开新”激活传统文化的解释力与感召力。近代以降,中华民族历经文化认知的三重嬗变:从农耕文明鼎盛期的文化自信,到救亡图存时期的自我怀疑,直至新时代基于文明传承创新的价值自觉。这种从“文化俯仰”到“精神自立”的演进历程深刻昭示:现代化发展绝非文明同质化过程,文化创新更需突破西方中心主义的认知窠臼。当前,唯有立足“第二个结合”的历史方位,在守正创新中重构文明演进的话语体系,方能破除“传统—现代”的二元对立,激活传统文化的时代生命力,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筑牢文化根基。

3. 创新传统治理智慧转化路径,构建中国式现代化治理体系

融通传统治理智慧,完善国家顶层设计。国家治理顶层设计的完善,能够为构建和谐有效的社会秩序和激发国家治理的公民活力创造条件,需将传统文化中的系统治理思维转化为制度创新优势。“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的大局观,与“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价值导向深度契合。为此,应建立“传统治理智慧—现代制度建构”的转化机制,将传统价值意蕴与现代价值导向深度对接,嵌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力求增强深化改革和现代化建设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形成各领域相互促进、良性互动的局面^[17]。通过“制度创新—技术赋能—文化支撑”的立体化改革,实现治理体系从碎片化向系统化的转型升级。

重构秩序生成逻辑,创新社会治理范式。秩序代表着社会运行的有序性。理想的社会秩序应当是个体自由发展与社会整合协调、既有无限活力又不

失规约的有序状态。要推动传统文化中的秩序建构理念向现代治理范式转化。“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社会价值导向本质上与“礼法并用”的传统治理智慧一脉相承。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治理是一门科学,管得太死,一潭死水不行;管得太松,波涛汹涌也不行。”^[18]应当将传统治理智慧影响下的现代价值导向贯穿于一切社会活动领域,促进社会系统内部良好生态的构造以及体系内诸次体系间、要素间的良性互动,形成各个现代化主体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交往和相互作用的有序状态^[19],使社会生态既保持“流水不腐”的活力,又具备“海纳百川”的秩序弹性,为中国式现代化创设稳定和谐的社会环境。

激活主体治理自觉,构建全民参与体系。破解现代化进程中的“参与倦怠”难题,需构建传统文化浸润与治理实践创新的双向机制,以实现文化浸润中个体参与治理现代化的自觉。通过实施数字治理学堂等新型载体,将修身齐家的伦理准则转化为“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现代公民道德规范;运用“线上诉求表达—线下协同解决”的闭环机制,使“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传统使命具象化为“躬身入局”的治理参与。重点在社区治理中融入“邻里守望”的传统美德,在政务服务中彰显“民惟邦本”的价值导向。通过构建从大同理想到共同富裕实践的价值转化通道,让明德、亲民等理念升华为全民参与的治理实践,最终形成传统文化滋养与制度优势转化的良性循环。

结 语

文脉与国脉相连,文运与国运相牵。中国式现代化的纵深推进,亟须从历史传统中汲取智慧,于文化精髓中提炼价值共识。“两个结合”作为必由之路和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方法指引。在价值维度上,以共产主义理想凝聚民族精神共识,用实事求是方法论贯通改革发展实践,借协和万邦文明观创新全球治理范式,彰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立足中华、开放包容的品格。实践创新中,必须立足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通过创新“第二个结合”的转化机制,聚焦国家治理现代化目标,构建传统基因与现代文明交融共生的文化生态。新征程上,必须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根本遵循,深刻把握中华文明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等突出特性,自觉践行“两个结合”

的实践要求,使传统文化中的治理智慧与价值理念焕发时代生机,激发人民群众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创造伟力,在传统与现代的辩证统一中谱写新的文化华章。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219.
- [2]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18.
- [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97.
- [4] 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1516.
- [5] 习近平.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55.
- [6] 习近平重要讲话单行本:2023年合订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4:44.
- [7] 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11.
- [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9]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106.
- [10]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M].北京:学习出版社,2023:293.
- [11]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不断深化对党的理论创新的规律性认识 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取得更为丰硕的理论创新成果[N].人民日报,2023-07-02(1).
- [12] 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8.
- [13] 习近平.同舟共济 继往开来 携手构建新时代中非命运共同体:在中非合作论坛第八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4.
- [14] 习近平.携手同行现代化之路: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主旨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8.
- [15] 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284.
- [16] 列宁专题文集:论马克思主义[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95.
- [17] 燕继荣.体系与能力再造:新时代十年国家治理改革[J].中国行政管理,2023(10):6-13.
- [18]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建设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125.
- [19] 张静,张陈.马克思的社会秩序观[N].光明日报,2012-05-01(5).

Research on the Path of Excellent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Cultivating Socialist Core Values

Li Nan Li Yufei

Abstract: The excellent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as the spiritual lifeline of the Chinese nation, is an important source for cultivating socialist core values. The study of the interaction mechanism between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nd socialist core values can be carried out from three aspects: theoretical logic, value implications, and practical paths. At the theoretical and logical level,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guiding position of Marxism provides a value foundation for 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 of traditional culture; The methodological innovation of the “second combination” constructs a dialogue mechanism between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The practice of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has formed a scientific paradigm for th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resources. In the dimension of value implication, the ideal of the “Great Way Journey” in excellent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resonates with the communist faith, laying a common ideal foundation for the socialist core values;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the practical wisdom of “seeking truth from facts” and Marxist methodology has solidified the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 for cultivating values; The integration of the civilization concept of “Harmony among All Nations” and the value of the concept of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have expanded the civilization perspective of global governance. In terms of practical path: Strengthen the Party’s leadership over ideological work and consolidate the ideological front; Activate the vitality of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reshape cultural subjectivity; Innovate the mechanism for transforming traditional governance wisdom, construct a modern governance system, and form a logical framework of “upholding integrity innovation application”.

Key words: socialist core values; excellent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cultivate; path

责任编辑:思 齐